

南京乡村调查

杨青松 陈新颜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乡村调查

杨青松 陈新颜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乡村调查/杨青松,陈新颜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2

ISBN 978-7-5641-0665-2

I. 南... II. ①杨... ②陈... III. 乡村—社会调查—南京市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6690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江 汉

新华书店经销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1 字数:281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41-0665-2/C·12

定价:25.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经营部调换。电话:025-83792328)

说 明

最近,我们组成专门的课题组,来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研究室)调研联系点江宁区江宁街道牌坊行政村,运用社会学调查的原理,以驻村蹲点的方式,对农村的基本情况和有关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并在操作层面上,探索具有南京特色的新农村建设运行模式。

通过调查与思考,我们根据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要求,对这一运行模式提出初步设想及建议:以“和谐、富裕、文明”为主要目标,按照“统筹谋划,分而治之”的发展思路,构建“三个跳出,一个加强”的主体框架,明确“市场化、郊区化、功能化”的推进方向,全面推进南京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本项课题调查,共发放问卷 240 份,回收 207 份,回收率为 86%;召开座谈会 12 场次,参加人员 104 人;访谈村民 76 人,占该村人口总数的 4.02%;形成专题材料 53 篇,问卷统计 5 篇;调研时间从 2006 年 3 月 28 日起,至 5 月 28 日止,有效调研时间为 53 天。

2006 年 5 月 30 日

目 录

1	3月28日	想起了田野调查
2	3月29日	牌坊村的样本意义
4	3月30日	从城市出发
5	3月31日	四季风雨
7	4月1日	炊事员的烦心事
9	4月2日	德与才
11	4月3日	新农村之辨
13	4月4日	80岁的吹鼓手
14	4月5日	清明
16	4月6日	人在黄昏
19	4月7日	陋习
20	4月8日	病变
21	4月9日	芝麻与山芋
23	4月10日	贫穷与富有
28	4月11日	远虑与近忧
32	4月12日	牌坊式民主
35	4月13日	牌坊式企业
37	4月14日	曾经的茶园
39	4月15日	苦茶
42	4月16日	采茶婆
43	4月17日	“三叉子”夭折记
45	4月18日	座谈会(一)
48	4月19日	座谈会(二)
51	4月20日	遗憾的事
53	4月21日	修志梦
55	4月22日	乡村哲思
57	4月23日	平安之忧
60	4月24日	采石风波
62	4月25日	树苗事件





4月26日	“精神家园”	63
4月27日	路边的孩子	65
4月28日	曾经的林场	67
4月29日	宁静的夜晚	68
4月30日	孤独的电	70
5月8日	垃圾问题	72
5月9日	卫生院的尴尬	74
5月10日	医保之道	76
5月11日	希望的田野	78
5月12日	房子·房子	80
5月13日	乡村往事	82
5月14日	生活图画	84
5月15日	探源	86
5月16日	油菜花开	87
5月17日	小店	89
5月18日	创业场	91
5月19日	国策与人策	93
5月20日	寻找南京模式(一)	95
5月21日	寻找南京模式(二)	97
5月22日	寻找南京模式(三)	99
5月23日	寻找南京模式(四)	101
5月24日	寻找南京模式(五)	103
5月25日	寻找南京模式(六)	106
5月26日	寻找南京模式(七)	108
	问卷统计(一)	111
	问卷统计(二)	122
	问卷统计(三)	128
	问卷统计(四)	139
	问卷统计(五)	150
	问卷样式	161

3月28日 想起了田野调查

所谓田野调查,即指社会学中的一种实证型的调查。它既不是按照预先拟定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查材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它的重点是直观社会本身,力图通过记录一个个鲜活的人、事、物,来反映调查对象的本质。田野调查的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的过程。

目前,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新农村建设工作成为我市“十一五”期间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战略。市委、市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与举措,已经成为我市“三农”工作之集大成者。然而,新农村建设,在中国整个社会变革的历史上,已存在了近百年。百年来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能否于朝夕之间迎刃而解?我们对政策的科学性并不疑虑,我们只是对其执行绩效感到心中无数。于是,想到了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及丰硕的成果。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适应开展农民运动的需要,作了大量的农村社会调查。尤以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最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于1936年在江苏省庙港乡开弦弓村开展了实地调查,并依此整理出来的材料写成了博士论文,最后成书出版(《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此书被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的人类学家)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八九十年代,我国产生了一大批通过田野调查方式形成的农村方面的学术专著。这些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领袖的田野调查,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学者的田野调查,构建了学术的新理论与框架。而我们所诉求的,则是目前新农村建设中最为广泛的农民的心愿,它实际上也是我们研究者的心愿。同时,它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据。

关于南京地区的乡村田野调查,我们分别在《金陵大学农林丛刊》以及《农村新报》上查到两篇文章。一篇是乔启明所作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研究》,另一篇是姚佐元所作的《南京城内农家之分析研究》。发表的时间都是1934年,距今已有72年。这个时间,似乎太长了。

用传统的调研方法去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又积淀了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对此并无把握。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对陌生田野的向往,以及对农民兄弟并不陌生的情愫。





3月29日 牌坊村的样本意义

我们选择牌坊村,看起来是偶然,实际上又是必然。

从空间距离来讲,牌坊村到主城区是57公里。因为这样的一个空间在主城的辐射之内;也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距离,牌坊村作为农村的典型形态,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

从产业发展来讲,牌坊村以种植业为主,其中以经济作物茶叶的种植小有特色。它是标准的以农业为支柱的地区,是纯而又纯的农村,也是新农村建设中最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的代表地区。

从农民收入来讲,牌坊村作为江宁的西部地区,始终是该区发展的一个薄弱区域。它在全区平均收入之下,也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这个收入,是一个真实的收入状况,这部分人群也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重点关注的人群。

从组织体制来讲,牌坊村是在3年前由黄龙岷林场和当时的牌坊村合并而成的一个行政村。它与全市大多数远离都市并在行政区划中不断被调整的行政村一样,面临着新机制与新的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困难。

从地形地貌来讲,牌坊村是丘陵平原地形,平原有平原的特点,丘陵有丘陵的特色。这与南京周边地区绝大多数农村多样化的地形也似乎差不多。它的山脉与水系,有着十分典型的代表性。

从历史渊源来讲,牌坊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国,这可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其中的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其中的社会陋习也是根深蒂固。

从政策研究来讲,目前,我市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大政方针已定,其针对性、实效性都有待于在最基层的组织——行政村进行推进、实施和检验。

从调研方式来讲,我们选择的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田野调查方式,通过“解剖麻雀”,了解最真实、最具体的情况。并通过走村入户的访谈方式,深入了解生产、生活、民俗的发生和变化,这是一种新的研究和思考方式。

从起始时间来讲,我们选择的是初春时节,这时的农事和农活日益繁多。生产资料的价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在这样的时间段中都能有比较充分的反映。

从发展潜力来看,牌坊村临近江宁区的滨江开发区。沿江开发的战略,给这个以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村子以无穷的想象力。村级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就业业务工、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区紧紧相连,而产业的升级、土地的纠纷、拆迁的补偿

等所有问题,在这里都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

但是,这里毕竟只是牌坊村,它只是全市 700 多个行政村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村落,它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但是,它也许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具有特别的意义。

牌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的文化内涵丰富而又让人不可捉摸,它对现实的表述也容易让人语焉不详。我们认为,正如牌坊的象征意义一样,牌坊村也不是一个典型,它只是一种类型。牌坊村的样本意义,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起点。这种样本意义,也许能够成为我市新农村建设中一个让人倍感意外的起点。





3月30日 从城市出发

从城市到乡村的道路是漫长的。

去年,我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见》及其5个配套文件,统筹城乡发展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最近,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铺开。为适应新农村建设,市政府将继续在规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加强宏观调控。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成为市政府重要的公共职能。

我们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但我们一定是政策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为此,我们准备出发。一是进行资料准备。分门别类查阅“三农”方面的资料;购买了一批书籍,如《黄河边上的中国》、《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等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专著。二是制定具体方案。设计调查问卷和座谈会提纲。三是沟通协调蹲点事宜。调查的主要形式是座谈、入户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第一,召开座谈会。拟召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负责人座谈会”、“老党员、老支书座谈会”、“村民代表座谈会”、“小学、幼儿园教师座谈会”、“医院、卫生所、计划生育管理站负责人座谈会”、“水厂、变电所、土地管理所、工商所、储蓄所负责人座谈会”、“村办企业、民办企业负责人座谈会”等9场座谈会。第二,入户调查。深入农户,更加细致地了解情况。第三,走访。到养老院、贫困户、烈军属进行走访。我们为此次调研明确了工作要求,即“充满感情,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有所创新”。

这个城市中大部分的人,往上不出三代,肯定是来自农村。就像是雍容华贵的金鱼的祖先,就是那些游荡在河沟中的鲫鱼一样。我们都是农民,我们都属于田野。

从城市出发,意味着政府政策的立足点往往落脚在城市;从城市出发,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走到乡村。

但是,我们毕竟出发了。

3月31日 四季风雨

牌坊村的气候,与我们在城内感受到的基本一致。但是,在这里,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季节的变化。

一、四季气候

本村属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具有动植物繁衍生长的良好条件。

春季。日照平均气温稳定在 10°C 以上,通常从清明开始到芒种结束,计 68 天左右。气温由冷转暖,冷暖交替,多阴雨,常有寒潮、霜冻等灾害性天气出现。

夏季。日照平均气温稳定在 20°C 以上,通常从夏至开始到白露以后结束,约 102 天。夏季本地区天气主要特征是高温、高湿、雨量集中,从 6 月中旬进入梅雨期,平均每年 20 天左右,七、八、九 3 个月常有雷雨、台风、冰雹等自然灾害。

秋季。一般从秋分开始到小雪结束,历时 62 天左右,气候由暖趋凉,常有“一场秋雨一场凉”之感。秋分过后,长江中下游常受高压控制,大气层比较稳定,此时,秋高气爽,气候宜人。

冬季。冬季时间最长,一般从 11 月下旬到次年清明止,达 135 天左右。此时气候最寒冷、最干燥,最低气温常在一 6°C 左右,常有寒潮、霜冻和雨雪出现。

二、气候要素

日照。全年日照时数 2 352.2 小时,日照百分率 53%;最少的 1970 年日照为 1 925.9 小时,日照率 43%。全年日照最长为 7 月,计 226.4 小时,日均 7.66 小时;最短为 2 月,计 137.5 小时,日均 4.41 小时。夏季(6~8 月)日照时数 664.6 小时,日均 7.22 小时;冬季(12~2 月)日照时数 452.7 小时,日均 5.05 小时。全年总辐射量 115.7 千卡/平方厘米,其中七八月辐射量最大,日平均 13.6 千卡/平方厘米;12 月辐射量最小,日均仅有 6.1 千卡/平方厘米。

温度。全年平均气温 15.6°C ,全年 1 月最冷,平均温度 $2.2\sim 6^{\circ}\text{C}$;7 月最热,平均温度 $28\sim 31^{\circ}\text{C}$ 。常年最低温度 -8°C (1977 年),年极端低温 -14°C (1955 年 1 月 30 日);常年最高温度 $36\sim 38^{\circ}\text{C}$,年极端高温 40.7°C (1959 年 8 月 22 日)。

温差。中部平原地区和东西两侧丘陵地区年平均在 0.5°C 以内,冬季丘陵区比平原区偏低;夏季丘陵区比平原区偏高,差值一般在 0.5°C 上下,农作物成熟一





般丘陵早于平原区。

降水。全年平均降水量 1 030 毫米左右,常年六七月份降水量最多,平均达 164.3 毫米,年最大降水量 1 382 毫米(1954 年),年最少降水量 425 毫米(1961 年),其中 12 月和 1 月降水量极少,仅达 30 毫米左右。

村内常年有 3 个多雨期,3~4 月份前后多东风,低温、寒湿,出现绵绵春雨,俗称“桃花水”;梅子成熟季节多锋面雨,叫“梅雨”或“霉雨”;8 月份前后,台风北上,带来大量降水,形成连绵不断的秋雨。

村内秋旱比夏旱频率高,周期短。1913—1981 年的 69 年间,有 17 年秋旱,平均 4 年多一次;有 12 年夏旱,平均 6 年不到一次。夏旱比秋旱造成的灾害重、幅度大,夏秋旱年份全年降水量不及常年年降水量的一半。

村内降雪次数和降雪量偏少,1952—1984 年的 33 年间,年平均降雪量 8 厘米左右。年最大降雪量有 3 次:一次 55 厘米(1954 年 12 月 31 日);一次 58 厘米(1955 年 1 月 1 日);一次 50 厘米(1984 年 1 月 18~19 日)。雪多年丰。

风向风速。累年平均风速 1.4 米/秒,风向频率全年静风最多,占 50% 以上,其次是东北信风和东南季风,风速一般为 2.5~4.0 米/秒,在北方冷空气南下时,常出现东北大风,瞬间风速 26 米/秒(1952 年 2 月 23 日),受风包线影响极大风速 37 米/秒(1974 年 6 月 16 日),西南季风偏少,多发生于 4 月下旬~7 月间。风速大灾害性多,境内 8 级以上西南风在 1951—1977 年的 27 年间出现过 4 次,平均 7 年一次。1964 年 7 月初,连续 20 多天西南风,干热增大。

霜期。据资料记载,村内 1957—1984 年出现白霜,初霜期均在 10 月下旬,其中旬末 7 次,占初霜期 63.6%;终霜期 10 次,均在 4 月,其中上旬 7 次,占终霜期 70%;初霜期最早在 10 月 21 日(1984 年),一般在 11 月上旬,终霜期最迟在 4 月 9 日(1982 年),一般在 4 月上旬,全年霜期 171 天,占全年天数的 46.86%。村内低温期较集中,有利于越冬作物生长发育,但对三麦、油菜发芽、开花、结荚和早稻育秧不利。

(原载《陆郎镇志》初稿)

4月1日 炊事员的烦心事

村委会聘请了一位炊事员，叫胡从华，我们称他为胡师傅。胡师傅初次见面，有点局促，话语不多，只问他做的饭菜合不合口味。胡师傅中等个头，一脸憨厚，手艺不错。

通过两三次交谈后，我们之间逐渐熟悉起来。胡师傅早年当兵，退伍后在镇政府食堂工作近30年。前几年因为乡镇机构精简，被辞退下岗。辞退后每月可领取100元，直到55岁。去年他被聘请到村委会工作，每月工资450元。他家里共5口人：老伴，一个女儿，一个上门女婿，再加上一个外孙。前几年，女儿花钱买了个城镇户口，胡师傅称这是花钱买罪受，女儿责任田没有了，也享受不到城镇人的福利待遇，两头都没有着落。女婿买了一辆长安面包车，在镇街上搞运输，一年下来有近3000元收入。家里通过种茶所得的纯收入有4300元。这样全家年收入有1.5万元左右。

胡师傅因为在乡镇政府工作过，有一定的人际关系。以前的朋友、同事，现在的同事、邻里有什么婚丧嫁娶、生日等大事情，都会邀请他参加。这样一来，他每年用于人情往来的费用就达到3000多元。他说自己的工资就这样给“糊”掉了。他很是无奈，但这些“份子”钱的支出又必不可少，否则会被别人瞧不起。他说，这些人情花费对于较高收入的家庭没什么，可对于像他这样的收入家庭来说，就是一笔占大头的开支。

昨天胡师傅告诉我们，他要去参加外甥的婚礼。我们的饭菜他早上会准备好，中午、晚上就请门卫陈师傅帮忙热一下。他说，舅舅与外甥的关系非同一般，外甥结婚，舅舅不仅要出厚礼，而且必须亲自到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要求随他一起去，顺便做一些现场调查。任凭讲了各种理由，胡师傅就是不同意带我们前往。农村是个熟人社会，它对外来事物、陌生面孔，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排斥。过去是在社会学书中读到的，还有一些不以为然，今天在实践中印证了。

胡师傅一年当中用于人情交往的开支，占他工资收入的一大半，他很是苦恼。而拒绝我们随他一同去参加婚礼，似乎又得罪了我们，这成了他这几天的烦心事。

从胡师傅的烦心事可以看出，在如今的农村社会中，人情往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城市社会中有机关、企业、学校、协会、社团等各种正式组织，这些组织都有明确的章程和制度。但农村社会没有这些明文规定的



准则,更多的是一些无形的关系。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关系构成了农村特殊的社会秩序和结构。这个社会结构中的规则都是潜规则,人们按照这些潜规则来行事。每个人在内心对周围的人都有亲疏远近之分。血缘关系越亲、相处越熟悉的人之间信任度越高。反之,信任度逐渐减弱,直至对陌生人从一开始便产生抵触、拒绝、敌视的心理反应。人情交往是农村社会秩序存在的基本载体,也是人们互动的重要模式。

客观地讲,人情交往带有经济互助的性质。据我们了解,胡师傅外甥的婚礼,一共有10桌,每桌坐8人,胡师傅出了500元的“份子”,其余的人是100~200元不等。这样下来,除了酒菜的成本一桌100~150元以外,大约可以落下6000多元。据胡师傅讲,去年他家里盖房子,也请了10多桌,收了3000~4000元的“份子”。在牌坊村这种人均年收入3000元左右的村子,这笔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一方面,农村人情交往,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人们通过这样的机会,既巩固原有的亲朋感情,也可以不断结识新的人,拓宽自己交往的范围。这是熟人社会中发展私人关系、培养个人感情最放心、安全的途径。人们相互交流生产、生活方面的大、小事情,消除内心不安,产生一些共鸣,形成相似的观念。另一方面,这种交往方式又具有物质上的互济性质。在欠发达地区,农民们的这种以人情往来方式形成的互助,已经占到家庭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这种经济关系没有规则,只凭约定俗成。这种经济关系的利益并不确定,只凭人的道德良心。应该讲,这是一种传统,但对现代生活而言,无疑是一种落后。

从外甥婚礼上回来的胡师傅,心情还是不错的。他告诉我们他喝醉了。实际上,他是醉在他认为不能舍弃的那份亲情中。

4月2日 德与才

今天上午,江宁街道工委张钧副书记、纪华斌组织委员闻讯赶来,表示欢迎我们的蹲点调查活动。大家一起在村里食堂吃了便餐。饭后,我们利用午休时间,与两位街道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其间,主要涉及村干部的德与才。

我们问,在培养村干部过程中,德与才哪个更重要?张钧副书记说,村干部德很重要,德比才更重要。全镇经济发展,街道有专门的班子在抓。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地方稳定。

我们问,村干部的德与乡村发展有多大的关系?他们说,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村干部的德与农村稳定直接挂钩。村干部要是私心太重,处理村里问题不公正,老百姓就会有怨气。大家又是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些怨气积累多了,很容易引发群体事件,阻碍经济发展。他们反复说,一个地区只要有了专门负责经济发展的班子,再加上班子成员有能力、肯干事,地区经济就肯定能够做起来。滨江开发区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近两年来,滨江开发区发展得很快,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好班子。此外,园区开发建设涉及各方利益,但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其中,村干部的配合工作功不可没。

我们问,如何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他们说,德可以生才。只要村里“一把手”有德,那么他就可以凝聚一班人。实践也证明,一个地方的“一把手”有德,这个地方的事情肯定可以干好。要是“一把手”无德,即便有才,也会把班子搞得支离破碎,根本做不成什么事情。他们还说,“一把手”的德非常重要。有时候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但有时内行并不能做好领导协调工作。

总体看来,组织部门在培养村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时,更倾向于德,德比才更重要。乡村都是熟人社会,大家朝夕相处,一举一动都在眼皮底下。在一个组织内部,管理者要是待人不公、处事不周,组织成员就容易产生挫折、沮丧等心理,甚至产生被剥夺感。这就决定了村干部处理利益纠纷时,需要“一碗水端平”。一旦怨气产生,就不容易消散;怨气也很容易在乡村积累,这跟乡村的封闭性有关。村干部必须具备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才可以很好地适应乡村的特点。中国农民历来善分,以分到家庭为止,从来不善于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除非出现一个能够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能全心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带头人”。对这个“带头人”来讲,道德的分量就更重一些。

村级组织是党和国家在乡村的政权组织,但它不是一级政府。法律规定村委





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级组织“一把手”必须拥有很好的乡村权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一个镇长不一定能做好行政村“一把手”的工作。因为镇街行政权力来自国家,具有法律强制性。而乡村自治更多地体现为乡村权威的运用。政府培养乡村“一把手”时,以德为先,正是满足了这种权威的需要。

值得关注的是,镇街政府积极主动培养乡村“一把手”,这表明农村自治并不是完全村民自治,而是有限的村民自治。乡村权威中寓含了国家权威。现实中,村民发生矛盾,往往不去打官司,而是请村干部评判处理。村委会成为了村民心目中的“政府”、“法院”。村干部的“以德服人、以德安村”的作用就显现出来。村级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但在某种程度上胜似一级政府。以德治村实际上是以德治国在微观层面的具体实施。

于是,我们想,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是不是应该有两个:一方面是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能人,不是偶尔地产生,而是要大批大批地产生,并且要具备大批大批产生的文化前提与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是要花大力气把“不会管事”、“没有办法”的村民提高到有办法、有能力管理自身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

这也许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之一。

4月3日 新农村之辨

今天下午,我们在村委会二楼会议室召开了村干部座谈会。与会的有支部书记周明(43岁,大专)、主任陈从新(45岁,高中)、支部副书记王国保(43岁,高中)、会计丁伯才(53岁,初中)、妇女主任许寿英(43岁,高中)、房管员丁伯荣(42岁,高中)、林管员张道福(53岁,高中)、治调主任胡从富(42岁,初中)、村统计员冯俊(36岁,初中)等。会上,我们询问了村干部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过整理,归纳出以下几种说法:

周明说,村里要富裕,村容要整洁,老百姓日子要过得好,这就是新农村。陈从新说,旧农村是脏、乱、差;新农村是卫生、干净和富裕。王国保说,大家日子普遍都过得好;太穷的人日子也能过得下去;大家有互助精神,农村出了什么事情,相互之间能够提供帮助。张道福说,生产高度发达,只有等经济发展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能说进入了新农村。胡从富说,大家都共同富裕起来,如果贫富差距太大,那就不是新农村了。许寿英说,能够为低保户提供有效的保障,提高农村最贫困人的生活水平。冯俊说,房子要住得称心,符合时代特点;生活要跟得上时代要求;老百姓收入要能不断增加,和城里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小。

周明最后总结说,现在上面要求搞新农村建设,具体的办法和意见都还没有看到,我同支部一班人还没有坐在一起讨论。过去也有一些思路,主要还是集中在发展经济上,村级经济发展了,手里有钱,就可以更多地为老百姓办事。新农村的建设,主要还是看村支部和村委会为农民办事的能力。我们觉得有责任、有压力,但办法还不是很多。

从发言的情况来看,村干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识不是太清楚,理解的角度还不一样,标准和模式也比较模糊。主要的原因一是上级未有布置;二是信息来源比较庞杂;三是自身文化素质有所限制。

通过比较,我们认为,一是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理论指导。目前,研究“三农”问题的理论体系比较完备,调查与实证的资料也相当丰富。特别是在李景汉、费孝通等学者的努力下,“三农”问题与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指导了长达数十年的农村实践,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只有先进的理论才能推动有效的实践。因此,要加强对农村发展历史以及社会学的有关理论的认识和学习。二是新农村建设要有地方特色。新农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政治任务。但是,新农村建设不能泛政治化,而要突出建设的特色。对南京而言,即要有在中心

